

# 本土化是个伪命题吗？

罗家德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如需引用，请引自：

罗家德，2018，「本土化是个伪命题吗？」，中国文化与管理编辑部编辑，南开管理评论网页 <https://mp.sohu.com/profile?xpt>

## 一、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命题

最近谢宇教授(2018)有篇文章《中国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引发十分大的反响，应《中国文化与管理》执行主编吕力的访谈，要求我对这个问题提出想法。这是一个访谈实录，所以并没有依照学术论文的格式与写作方法，后面还附加了我的一篇讨论博特(Burt and Burzynska, 2017)的评论文章(罗家德, 2018)，说明本土化概念走向全球的一个趋势，并用以综述我对此一问题的看法。

我的观点是：本土化是一个好命题，但关起门来的本土化是个伪命题，而且这论述的范围不限于社会学内，因为近来管理学中也有了类似的关起门来本土化的现象，值得警惕。我从五个方面来阐述这一观点：

### (一) 好的本土化研究到最后也会是全球的

关起门搞本土化是个伪命题，因为我永远相信好的东西就是天下万物为我所用，不管理论是中国本土发展的，是中国哲学来的，还是西方来的。好的本土化研究到最后一定是全球的。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观察日本文化，Ouchi 得到的 J 理论，到了美国，美国人一看说我们不也是这样？它就成为了与 X 和 Y 理论并列的 Z 理论，是全球的了。你可以想象到，美国人可以说虽然是日本来的理论，但是也能为我所用，毕竟人性大量是共通的。同样的，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是我在建构圈子理论时，英文译作 Guanxi Circle，圈子是很有中国特色的，因为它是费孝通(1998)所讲的个人中心差序格局网，但是，美国学者博特看完了之后他先改了名字叫 debt circle (circle of favor debt)，但后来越来越接受关系这个概念，就又用 Guanxi Circle 这个词汇了。

他最近在 MOR 一篇论文中写得很清楚，“关系”(Guanxi)在中国是一个普遍现象，但他认为“关系”在美国也存在，其实在全球，西方中尤其是意大利、西班牙那就更普遍了。而且，他认为美国的精英阶层其实也很懂得怎么建圈子，美国精英阶层可不简单，他能拍出「纸牌屋」这样的连续剧，说明他们平常也都知道怎么建自己的个人圈子，美国的精英不也是如此？只是中国更普遍，中国可能连个最普通的老百姓都玩，美国没那么普遍，所以这圈

子对我们是显现象，很容易成为我们的研究主题，对美国人却是一个隐现象，除了少数如 Useem (1984)，Granovetter (2017) 等人会注意外，它受到的研究很少。社会科学未知的知识还有太多了，我们的显现象很可能就是在「本土化研究」得到理论，但拿到西方一看，他们会说，我们也是如此，只是未受到注意罢了。同样道理，没有什么理论，你敢说它是百分之百只有中国有，就算有了，也只是非常小的部分，大部分理论都是普适的。

## （二）方法论的争论本质上是部分学者固步自封与不肯学习的结果

前一段时间，国内管理学界曾经也进行了一场方法论的讨论，争论的主题包括定性和定量、理论和实证哪个好哪个不好，不同科学哲学哪个更适用管理学等等。直到现在仍然在这种争论之中。这种争论也夹杂在本土、全球的议题中，但方法哪有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分，哪有东方西方之分？简单地来讲，很多学者真正的问题就是不肯学习新的研究方法，但他会找一大堆理由，因此陷于争论之中不能自拔。

我认为真正做研究必须根据所研究的问题来选择相应的方法。例如我做圈子理论，出于社会学的理论，但我们的团队中有物理学家，统计学家，有计算机学家，有经济，也有经管学者。简单来讲就是好的研究是合作出来的，不是你分我分出来的，分什么定性、定量，什么理论、实证，什么大理论、中层理论，什么结构化数据、还是大数据，好的研究是这些都为我所用。类似地，在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我丝毫不认为方法有国界之分，好的方法往往都是相互借鉴的。

## （三）中国文化与哲学在研究中有作用，但好研究是在与西方理论比较中进行的

我非常赞赏杨百寅教授把西方理论中的公民行为修正成中国本土的主人翁行为(杨百寅与梅哲群，2014)，但他的团队又发觉，所有的主人翁行为问项有相当高比例与公民行为的重叠，还是人性有共通之处。

但是这中间的区别在哪里呢？我认为深入进去就是中国哲学和文化，核心就是我刚讲的，中国人连结是基于宗族式(clan)的，美国人则是基于俱乐部(club)的，这是许烺光(Hsu, 1963)说的。俱乐部是什么？简单来讲，我们有共同理想、共同志业、共同兴趣，乃至于我们有共同利益目标诉求，我们就成立一个协会，或者更松散的俱乐部，但是参加的人有一个明确的边界，你是会员还不是会员？是会员就权利义务明确，谁要做什么谁能得到什么，很清楚。到最后他就会有一套治理机制，甚至还会被法治化，这是什么？这就是公民社会传统，从希腊城邦就是这样子，但你别忘记希腊城邦只有百分之十几二十几是公民，其他是没公民权的，很多是奴隶，只有公民有权利投票，以协会或俱乐部来说，他们才是会员，其他的人不是会员。

东亚的情况是什么？往往以一个人，中国也常常是一小组人，比如有些是以一个家族为核心，建立差序格局的人脉网，并以扩大家伦理来规范亲疏远近不同的圈层(梁漱溟，2012)，所以它边界不明显，常常发生的情况是，我以为我进老板的圈子了，但老板心中没有我。其实韩国不也是如此？它的大财团都是围绕在一个家族旁形成一个经营者的核心圈

子。不但圈子的范围不是很清楚，他权利义务也不是很清楚，有的时候进圈子了更倒霉，因为最近老板要找人背黑锅，圈外人不行呀，圈外人一背锅他给你告官去了，圈内人就可以说：这次牺牲你了，你只好默默接受，要杀要剐只好接受了，期待着将来得到补偿。

公民精神也罢，主人翁精神也罢，都能促成个人积极参与到一个集体的公共事务中，所以很多部分是共通的，但另一方面，一个是基于俱乐部式的，一个是基于宗族式的，所以又有不同。好的本土研究一定是和西方理论比较中得出的。

（四）社科、管理的理论还有待更多的开发，我们该谦逊地面对科学知识

我讲完这「圈子理论的本土与全球」以及「公民精神与主人翁精神」这两个研究案例以后，最想讲的就是，没有什么是「纯」本土理论，是不肯学习才分开来了，区分中国、西方，定性、定量，理论、实证，大理论、中层理论，这些都是伪命题，好研究是它们一起构成的，今日的本土会是明天的全球，今天作定量明天作定性，今天想理论明天想实证，循环往复地做，才能得到好研究。只有学习与不学习才是真命题，就是有人愿意学，有人不愿意学，不愿意学就会找出一堆理由拒绝了解对方。方法是无国界无学科之分的，理论管你来自中国哲学的启发还是社会科学的演绎，管你是社会学还是经济学，管你是海外来的还是本土产生的，都该为我所用，胸怀天下，立足本土，才能作出好研究。

好的理论，从中国开始一定会走向世界，也会有一些理论走不向世界，但绝对不会是重要理论，说明他跟人性落差太大，太中国特色了，这些在中国人的行为中也只占很小一部分，中国人行为很大一部分还是世界共同的，所以外国理论拿来就能用，还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刚刚讲的，中国的显现象，西方的隐现象，所以最后会是在本土研究中首先被发现，然后推广到西方，所以好的本土理论一定也是世界的。

现在有一种批评说西方来的理论不接地气，这确实是个大问题，就是外国的东西不经过消化就往我们身上套，为我所乱用，其实这是被我们的评价制度搞坏了，反正就是所有的论文都去 SSCI、SCI。但是有些学界搞得有点关起门来当皇帝，完全不管外面，自己玩自己的一套，每天就是在那里评这个奖评那个基地，算国内的积分，变成自误自乐的游戏，这也不行。还是要中庸和融合一点才好。

再来一个问题，外国还没有的理论，怎么从我们的土壤中发展出来？过分崇洋媚外的会犯这样的错，拿着西方的理论、问卷就去套，管他三七二十一，有的时候就套对了，有的时候就不妥，有的时候就彻底错了，中国人行为明明就不是这个样子，你硬要套，这是最大的问题。这其实是另外一种不肯学习的态度，因为他忘记了，美国拥有的社科、管理理论，也只是理论中的一小块，我们没有谦逊的心去看待社会科学，现在人类的知识可能只是能开发的科学知识中很小的比例，多的是理论会是从中国、非西方发展出来，流行世界，怎么能把今天西方发展出来的这一小块就扩大到百分百，手上拿著锤子万物就都是钉子，凡事都可以套。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不学习，两相激荡，就搞得国内很多学者反弹，带来另一极端的不肯学习。我还是要回过头来说，核心的核心都是学习，万事才为我所用。

(五) 站在西方现有成就的肩膀上，本土化研究可以大放异彩

格兰诺维特最近在提倡复杂化的研究，我一直相信中国人在这上面的理论突破会是不得了，中国人自带三分复杂思维。

复杂动态系统，复杂动态网，复杂适应，涌现现象，创新传播，复杂有关的所有研究将来肯定在中国可以得出很多理论，中国人还会得出很多方法，中国人的思维会特别合适这一套，复杂研究今天始自西方，将来却会属于中国，我们要有自信。但不是关起门了有自信，讲一堆外国人也听不懂，其实更糟糕的就是中国人自己也听不懂，只有他们抱团搞在一个山头里的人听得懂，关起门来当皇帝、抱团派系搞山头，只有那一小撮人能听懂，或者自己的徒子徒孙听得懂，搞一堆资源养一群学生来听他那个小游戏。好的东西是外国人能听得懂，这才叫做理论自信，这才叫做道路自信，我们要有这个自信的。

复杂的社会科学理论恐怕就讲了百分之五、百分之三？还有百分之九十几现在只能讲讲故事而已，有些案例，有些模型而已，我相信，中国本土研究在这里头有很大的空间，这里有很多都是中国人的显现象，我们好好去关注、去理论化，就有一大堆的新理论、新方法出来。为什么作为社会科学的复杂研究会大红大紫，因为现在有大数据的方法，从前动态复杂的研究没有大数据，除了讲故事，没有办法得到验证，也无法细化理论与模型，也搞过一些数学模型，反正好玩嘛，玩完就结束了。但现在不一样，大数据来了，理论得到验证，理论也能得到更细致的发展。

在方法上，理论上，我一直相信中国会在这里弯道超车，管理学、社会科学上都会有所突破，然后让西方察觉到，这个方法被中国人找到了，我们也要用，这个理论被中国人找到了，我们也要用，这是理论自信、道路自信。不是说关起门来讲一些老外们听不懂、自己人也听不懂，就剩下徒子徒孙能听懂的东西，然后在那里自娱自乐，现在国内这个风气不可长，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是支持谢宇的。

我认为关起门来本土化是一个伪命题，太多这样的「大师」，管他有多大的基地，管他有多大的声望，却讲一些东西人家几十年前就讲过，干嘛发明几个新名词再讲一遍？关起门来，在一个小圈子里对徒子徒孙讲一些自娱自乐的话。比如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与社会治理的议题及其对社会政策的影响就是当今本土研究的重大关注，但相关理论却在西方学术界有著悠久的历史，从治理问题的基本前题如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 (Simon, 1976)，到治理机制的选择 (Coase, 1993)，到治理机制选择的因素 (Williamson, 1996)，到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治理功用的提出 (Granovetter, 1985; Powell, 1990)，以致于有自治理的探讨 (Ostrom, 1990)。不懂得在已有的基础上建高楼，会使很多本土研究落入拾人牙慧而不自知的窘境。

关起门来的本土化是一个伪命题，真正的本土化是一个好命题，而且好的本土化最后一一定是全球的。

## 二、本土概念走向西方—关系是全球普适性的吧？

好的本土研究终将走向西方，这绝对有可能，知名的社会网学者，结构洞理论的发

明人博特 (Ronald Burt) 就正在这样做。关系一词 (Guanxi) 常常是管理学界认为最本土化的一个概念, 过去一直是中外学者研究中国管理问题时的一个关键概念, 我们能想像将来有朝一日美国学者在研究美国企业时也用关系这个概念指涉高层主管间一种特殊的交往方式吗?

博特在 MOR 上的一篇文章 (Burt and Katarzyna, 2017) 就开始了这样的把中国发展的理论引向全球的过程。下面引用我曾在 MOR 网上版发过的一篇小论文叫「关系现象是普遍的吗?」(罗家德, 2018) 介绍他的关系研究, 引用如下:

博特 (Ronald Burt) 的论文提出了两个最为有趣的议题, 一是他以社会网的角度对「关系」(guanxi) 进行了学术性定义: 「A relationship is a guanxi tie to the extent that trust is high and relatively independent of social structure around the relationship」(Burt and Burzynska, 2017: 20)。这定义包括了以下几点:

- 一、guanxi 是一种强连带。
- 二、它是有差序的, 因强弱不同而有不同。
- 三、关系越强, 信任程度就越高。
- 四、关系越强, 它就越和两人所处的社会网结构相互独立。

更有趣的是, 论文中以中国企业家发展过程里的五期比较静态社会网作为分析基础, 计算出证据, 支持了这样的定义 (figure 4; p. 14)。换言之, 关系可以被定义为一种不与结构封闭性有关的强信任连带。这不同于过去基于社会心理学提出的关系的定义, 不管是基于人情交换 (favor exchange; Hwang, 1987; Yang, 1993) 还是基于责任义务 (obligation; Liang, 1983; Zhang and Zhang; 2006; Mao, Peng, and Wong, 2012) 提出的定义。他称之为这是一种「建构有效概念构面」(identify construct validity criteria) 的定义方法。

当然, 该论文所提的定量证据其实是不充分的, 基本上只包括了企业家发展过程中五个关键期的主要工具性连带 (对企业家提出帮助的关键人物), 其中符合关系定义的连带很多是家人、拟似家人以及由情感性连带发展来的熟人, 这些人在和企业家结束工具性交往后, 可能还保持著其他社会网, 如亲戚网、情感网中的结构嵌入 (Granovetter, 1992), 如果用多重网进行分析 (Multi-level Network; Padgett and Powell, 2012), 其效果和只用创业中的工具网进行分析是否相同? 尚待进一步验证。

不过这一点上, 我基本还是同意博特的定义, 但用的方法却是「传统」的从日常生活的观察中推论的。简单的说, 就是家人或拟似家人关系一旦形成了, 在共同朋友逐渐远去的过程中, 比如老化中逐渐死去或两人分隔两地久了共同朋友都四散了, 两人间的强信任感再见面时依旧存在。换言之, 在中国人的关系圈子的最内核部分确实可以独立于两人周围的社会网结构而让强信任感持续存在。只是关系圈子还包括了熟人关系 (Luo, Cheng and Zhang, 2016), 从最内核到关系圈子的外围, 这样的独立性是否是线性的 (博特定义

中“to the extent”意即线性相关)，还有待进一步证据说明。

博特文章的另一个重大议题，是它提出了关系到底是中国人的特殊现象，还是全世界都有的普同现象。他还算出了西方的分析师与银行家网络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可以被定义为关系，而中国的企业家网络中却有三分之二被定义为关系。当然，博特也承认，这两群人间不必然有可比性，往往环境不确定性（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Williamson, 1985）越高的情境中，人们越需要关系性信任作为抵抗不确定性的工具（Granovetter, 1985），中国的创业家们显然身处比西方银行家更不确定的环境中。另外，博特计算西方银行家的「关系」时，用的是衡量方法是「两年或以上的交往时间」（p. 20），也不是他对关系衡量的构面——「信住度与结构嵌入程度的相互独立性」。

换言之，博特文章以为关系是“more or less”而不是“yes or no”的问题，也就是关系是中国人的普遍现象，却不是特有现象，这在西方也是存在的。这和我们过去大都强调关系是中国特有现象（Chen and Chen, 2004）不太相同。我基本支持这样的“more or less”主张，虽然其中的一些疑义仍值得进一步讨论。让我们先看看表现在关系上的一些中国文化的「特征」：

一、混合关系（mixed tie; Hwang 1987），就是关系是情感性动机与工具性动机混合在一起的一种强连带，这在西方强调二元对立、公私分明的文化里看来十分不寻常，但在格兰诺维特分析「相互为利的信任」（Hardin, 2001）时指出，人际连带一旦强到产生同理心时，会把对方的利益内化成自己的利益（Granovetter, 2017: 60），伤害了对方的利益也会感觉到伤心难过，使自己的利益受损，这时工具性关系是很难和情感性关系完全隔开来的。所以混合性动机在西方即使强调二元对立的的文化里还是存在的。

二、差序格局（differentiated modes of association; Fei, 1992），这是最知名的本土社会学理论，强调中国人都是以己为中心建构出一圈一圈由亲而疏的个人中心社会网，以后学者对中国人的关系分类也多以差序格局理论为基础（Yang, 1993; Hwang, 1987; Luo, 2011），但在西方也有十分类似的研究，就是邓巴圈的研究（Dunbar, 1993），西方人也能明显由亲密程度区隔出五圈的社会连带（social ties）。

三、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 Eisenstadt, 2000），差序格局最主要的涵义是指出中国人因为关系的亲疏远近而会有不同社会交换的规范，也就是说中国人是特殊主义的，不同于西方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Weber, 1964）。但「上帝之前人人平等」只是西方的文化理想，其实西方人也有「亲亲有等级」的现象，比如博特（Burt and Burzynska, 2017）就指出企业家精英网络中也有内外之别（Useem, 1984），所以特殊主义也很难说是中国人所独有，只是西方较不普遍而已。

四、家伦理本位（Liang, 1963），梁漱溟提出的这个概念意即中国人会把家庭伦理的思维由亲而疏、层层外推及于自己的圈内人，这确实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大特色，但它说明著中国人应用「家人」的概念在很多关系之中，是应用范围的广大，而不是说西方没有家伦理

的概念,即使在威廉姆森一直以为情感性信任不该存在的经济行动之中(Williamson, 1996),家族关系带来的特殊组织型式依旧在西方十分发达(Granovetter, 2000),尤其是法国、意大利以及西班牙文化影响所及的地方。

换言之,以「家伦理本位」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连带——关系,在中国,会建立出较大的个人关系网,也会在较多的情境中发挥作用,比如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使用关系的现象就处处可见,相比西方,比如企业精英网中结盟时的使用关系,中国确实是「关系社会」。但这都说明了关系现象是” more or less” 的问题,而不是” yes or no” 的问题。混合动机、差序现象、特殊主义、家伦理在西方都存在,只是适用的社会连带少的多,可使用关系的情境也少的多。

五、阴阳与动态平衡(Li, 1998),阴阳思维以及在关系发展过程中动态平衡的想法确实又是中国人的一大特色。然而在西方,动态网研究(Moody, 2005)还才刚刚开始,理论上,虽然也有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平衡耦合与脱耦理论(Balance Coupling and Decoupling; Granovetter, 1995; 2002),指出了社会网动态平衡的问题,但我们确实很少理论与证据说明,应用阴阳思维于关系动态发展之上,到底是不是在西方不存在的?还是西方「或多或少」也有相同的现象?这有待以后的动态网理论继续发展,才能够更准确地回答。

博特是外国人,但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过程是他对相关的社会网理论先是熟烂于心,然后进入中国场域,从六年前开始,他就几乎每年来西安或北京两次,和国内学者讨论相关概念,我们还在清华每年合办一场 Guanxi for Guanxi Study 的会议,已连办四年,经过不断地探讨,博特已完全接受关系理论,而且将之进一步发展。

好的本土理论不能关起门来当皇帝,在发展自己理论的同时就应该开始做与国际理论比较,在比较中间,我们就会发现西方有类似的理论,哪怕是这本土理论探讨的在中国是显现象,在西方是较次要的隐现象,但也会有类似的,比如说我们在谈关系的时候,西方已经成熟的理论中,比如强连带,邓巴圈,以及社会资本等等,就是可以比较的概念。关系当然有所不同,但不同在那里?相同在那里?因为中国现象中找到了这样的概念,博特一看,接受了,保留了中国所用的概念名词,而且说西方也有,进一步把它发展到西方的情境之中。

我讲这个例子是想说,一个好的本土理论,是在跟西方理论比较中间才能够被建构出来的,要不然很容易就重复发明别人早就成熟的理论,或自说自话,自鸣得意,这样外国学者就听不懂了。我承认,跟外国学者讲本土理论的过程非常辛苦,毕竟任何创新的理论别人接受都有困难,又有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外国学者也不一定都有一颗开放的心,也有大量的不肯学习的学者,让人气结。但再多的困难,好的本土理论还是要走出去,也能走出去。

简单地总结,本土化不是一个伪命题,但关起门来当皇帝的本土化绝对是一个伪命题,这不是理论自信、道路自信的表现,反而是不肯学习的结果,伴随著不肯学习,往往还

有一些定性好或定量好，理论好或实证好，大理论好或中层理论好，因果模型好或系统模型好，大数据好或结构化数据好之类的方法论之争，其实这些都是伪命题，好的研究一定是理论加实证，定性加定量，大理论加中层理论加理论模型，因果模型加系统模型，大数据加结构化数据，一个人作不了这些就一群人作，一个学门的知识不够就跨学门合作。好的研究是合作、包容、跨界学习得来的，不是抱团、派系、建立山头得来的，更不是关起门来当皇帝得来的。

只有学习与不学习才是真命题，跨国学习，跨学科学习，跨方法学习，跨理论学习才是真命题，任何「单边主义」，不理解对方就引发争论，争论的都是伪命题。

## Reference

- Burt, Ronald S. and Burzynska, Katarzyna. 2017. Chinese entrepreneurs, social networks, and guanxi.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doi: 10.1017/mor.2017.6: 1-40.
- Chen, X.P., & Chen, C.C. 2004. On the intricacies of the Chinese *guanxi*: A process model of *guanxi* development.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1:305-324.
- Coase, Ronald H. 1993. The Nature of the Firm. In Oliver Williamson and S. Winter(ed.), *The Nature of the Firm*: 18-61. NY: Oxford U. Press.
- Dunbar R. I. 1993. Coevolution of neocortical size, group size and language in human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6(04): 681-694.
- Eisenstadt, S. N. 2000. Trust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in Japan: The construction of generalized particularistic trust.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 53-72.
- Fei, H.T. 1992. *From the Soil—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ranovetter, M.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3): 481-510.
- Granovetter, Mark. 1992. Problems of explanation in economic sociology. In Nitin Nohria and Robert G. Eccles (ed.),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s*: 29-56.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 Granovetter, Mark. 1995.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firms and entrepreneurs. In A. Portes (ed.),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Essays in Networks, Eth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128-165.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Granovetter, Mark S. 2000. Revisiting Coase: Business groups in the modern economy. In Mark Granovetter and Richard Swedberg (ed.),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Second Edi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Inc.
- Granovetter, Mark. 2002. A theoretical agenda for economic sociology. In M. Guillen, R. Collins, P. England & M. Meyer (eds.),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Developments in an Emerging Field*: 35-59.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Granovetter, Mark, 2017. *Society and Economy—Framework and Principles*, Cambridge: Harvard U. Press.

- Hardin, R., 2001. Conceptions and explanations of trust. In K. S. Cook (ed.), *Trust in Society*: 3-39.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Hsu, F. L. 1963. *Clan, caste and club: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Hindu, and American ways of life*. Princeton, NJ: Van Nostrand.
- Hwang, K. K. 1987. Face and favor: the Chinese power gam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 944-974.
- Li, Peter Ping. 1998. Towards a geocentric framework of organizational form: A holistic, dynamic and paradoxical approach. *Organization Studies*, 19: 829-861.
- Liang, Shu-Ming. 1983. *Th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Taipei: Li-Ren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Luo, Jar-Der. 2011. Guanxi revisited--An exploratory study of familiar ties in a Chinese workplace.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Review*, 7(2): 329-351.
- Luo, Jar-Der, Cheng, Meng-Yu, and Zhang, Tian. 2016. Guanxi circle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taking a Chinese workplace as an exampl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33 (3) : 649–671.
- Mao, Y., Peng, K.Z., and Wong, C. S. 2012. Indigenous research on Asia: In search of the emic components of *guanxi*.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9(4): 1143-1168.
- Moody, J. 2005. Dynamic social balance. *Freeman Award Plenary Lecture*, Sunbelt XXV, CA: Redondo Beach.
- Ostrom, E.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dgett, John F. and W. W. Powell. 2012. *The Emergence of Organizations and Markets*. NJ: Princeton U. Press.
- Powell, Walter. 1990. Neither market nor hierarchy: Network forms of organization.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2:295-336.
- Simon, Herbert. 1976.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3rd ed.). NY: The Free Press.
- Useem, M. 1984. *The Inner Circ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eber, Max. 1964.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NY: Macmillan Publisher.
- Williamson, Oliver.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Williamson, Oliver. 1996. *The Mechanisms of Govern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Yang, G. 1993. Chinese social orientation: An integrative analysis. In T. Y. Lin, W. S. Tseng & Y. K. Yeh (eds.), *Chinese Societies and Mental Health*.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Yang, M. 1994. *Gifts, Favors, and Banquets: 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Zhang, Y., and Z. Zhang. 2006. Guanxi and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in China: A link between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level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67(4): 375-392.
- 费孝通, 1998,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梁漱溟, 2012, *中国文化要义*.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罗家德, 2018, Jan 16<sup>th</sup>, 关系现象是普遍的么?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Social Media Account*, retrieved in May 21st, 2018, from <https://mp.weixin.qq.com/s/OG5-o2NQoriE1F1ZES21qA>.
- 谢宇, 2018, Mar. 22<sup>nd</sup>, 中国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595594425177499809&wfr=spider&for=pc>.
- 杨百寅、梅哲群, 2014, 组织主人翁还是组织公民——基于中国社会文化视角的员工行为研究.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3期(第29卷), 146-153。